

空間、幻異、王治—— 《淮南》地理論中的治道邏輯研析^{*}

李慶豪^{**}

摘要

充滿幻設性格的《淮南》地理說，如何與「治道」有所連結而實現其在輔政功能上所存在的積極性？又，《淮南》內部存在著兩種類型的地理圖式：理序型地理圖式、渾沌型地理圖式；此二種圖式具體性格為何？彼此關係為何？他們何以被建立？本文環繞此數項問題展開探問。奠基在區隔出「地理學」與「地理思想」的差異，本文將《淮南》地理論理解為一套價值理念的空間化隱喻。透過拆解這些隱喻，筆者最終指出《淮南》地理論實質上是一套以道家無為說為核心所架建出之空間系統，而它最終所蘄向者，是以一神聖秩序來範定人間的行事律則，藉以保證此道家理念可獲得具體落實。故就理論型態言，終呈現作一出乎道家而復入乎道家的特殊格局。

關鍵詞：淮南子 地形訓 地理 渾沌 道家

2020.11.27 收稿，2021.06.23 通過刊登。

^{*} 本文撰作過程曾蒙蔡振豐教授悉心指導，並承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建議，特此申謝。唯文章有何疏漏，概由筆者自行負責。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Email: qinghao459@gmail.com。

一、前言

據〈要略〉述，《淮南》之作起於輔政，亦即它乃是一部以向治政提供輔翼為目的所被纂制之典籍。¹

只不過，當立足此點而更深入檢視，則《淮南》部分內容便不免顯得旨趣難明，蓋治政所重不離現實，但《淮南》不少述論則正呈對現實的出離，如其地理論即多是如此。因此，倘不視〈要略〉所語為謬，那麼對於這些記述與治政之連結如何可能？便成為必須予以回應之問題。

《淮南》地理論於〈地形〉篇中有較見集中的給出。就其性格特徵言，其所載真實地理偏少，內容簡略而多勦故說；反之，神話地理佔比為重，多有或即《淮南》撰者群所自作之論。²由是可指，幻設性之神話地理方乃是《淮南》地理論之主結構，而非真實地理。³

而倘對應於彼時社會已然出現的對神話地理的質疑之聲，⁴那麼〈地形〉作為地理學之價值在漢初時期斷可指為並不甚高。⁵然外此更為嚴肅之問題為，該

1 〈要略〉云：「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德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治，玄眇之中，精搖靡覽，棄其畛挈，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究。」張雙棣校釋，《淮南子校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2170、2200。本文之書作「《淮南》」者，所引文字，俱出該書，後於正文標篇名、頁碼，註腳列校釋者與書名、頁碼，不再一一詳註。又，《淮南》正文二十篇，篇名皆帶「訓」字，疑為高誘所加，故皆去之。

2 關於《淮南·地形》之內容解析，可參陳麗桂，《《淮南鴻烈》思想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頁122-143。

3 故如顧頡剛便把《淮南·地形》同《山海經》、《穆天子傳》、《神異經》、《十洲記》、《博物志》等地理學書，一併歸入「幻想的一派」。見顧頡剛，〈禹貢注釋〉，侯仁之主編，《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第1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頁6。

4 如司馬遷：「《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81，金陵書局本），頁3179。以下凡引《史記》皆用此本，為免繁冗，僅標漢·司馬遷，《史記》及頁碼。

5 部分學者如陳廣忠、王巧慧等對《淮南》在地理學史上的表現予以相對較高的肯定，對此，筆者仍持保留態度。見陳廣忠，《《淮南子》科技思想（增訂本）》（北京：

種地理論因為難以提供確然可據之認識以為施政之憑依，因此它之向治政利用而當有的存在積極性，可謂實質上便無可坐落；而同樣嚴肅的問題為，它於《淮南》中出現之意義亦難可彰明。

然倘就實際狀況論，劉安本於神仙怪異之事有所興好，故制纂了不少典籍，其中具代表性者即有《淮南外書》、⁶《淮南中篇》、⁷《枕中鴻寶苑秘書》等，⁸但充斥著幻異色彩的〈地形〉則被劉安置於講論治道之《淮南》當中，⁹此就存在定位說，毋寧也側面反映劉安對該文在輔翼治政上之作用意義的肯定。那麼〈地形〉究竟於何處、如何展現它之向治政而有之積極作用？不免便成為一亟待解釋之難題。

當代學者對《淮南》地理論之研究成績卓著，然關懷面向主要乃坐落向對〈地形〉內容的解譯及其地理學價值之考論，相當程度放失了《淮南》地理論同時亦作為政書而在的意義。而面對上述棘手問題，猶未見有較直接之回應。

奠基於《淮南》地理論的該種特殊性格，及《淮南》成書目的的特定蘄向，本文故擬採取別一新的解讀方式，我們假設：造成《淮南》地理論與治政課題的連結性的斷離的原因，乃起於一種視域（horizon）的錯位，亦即：長期間《淮南》地理論被予觀解的視域因於它自身之內容所具有之暗示性，故導引學者多只將之辨識作一「地理學」（geography）著作，而遺落它實際更有作為「地理思想」（geographic thoughts）之意義之一面，於是原本在《淮南》作為輔政而在的地理論，最終成為了為追索客觀地理知識而在的地理學。

案此二類著作的核心差別在於，「地理學」所著重者在針對一地客觀之自然或人文景況暨其運作理則進行記述；而「地理思想」所著重者則在針對大地的存在本身而發掘蘊存其中的可為人間行事所依尋仿依的意義與價值。故前者

中國文史出版社，2016），頁194-236；王巧慧，《淮南子的自然哲學思想》（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頁319-338。

6 《漢書·藝文志》：「《淮南》外三十三篇。」顏師古注：「內篇論道，外篇雜說。」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頁1741。以下凡引《漢書》皆用此本，為免繁冗，僅標漢·班固，《漢書》及頁碼。

7 《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漢·班固，《漢書》，頁2145。

8 《漢書·楚元王傳》：「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漢·班固，《漢書》，頁1928-1929。

9 學者或認為《淮南·地形》中也滲透有神仙思想，可參：陳麗桂，《〈淮南鴻烈〉思想研究》，頁122-143；王巧慧，《淮南子的自然哲學思想》，頁319-338。

的典型論述如《漢書·敘傳》：「坤作隆勢，高下九則，自昔黃、唐，經略萬國，燮定東西，疆理南北。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劃五等，制立郡縣。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¹⁰尚記經驗現實，所載之物皆實際可辨。而後者的典型觀念則如《老子》25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¹¹尚論抽象觀念，所載之理別於質測所得，屬一觀念性、意義性之存在。

《淮南》地理論在表層型態上無疑具有「地理學」之特質，故〈要略〉狀專載地理論之〈地形〉云「窮南北之脩，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眾，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¹²然其實際指向上則作為「地理思想」而存在的意義要更見重大，此種地理論之構形特性正猶段義孚論神話空間時所指：

神話空間是一種知識建構，它可能是人們煞費苦心建構的。神話空間也反映了人們對基本需要的感受和想像力。¹³

當掌握住此點，於是可知欲發見《淮南》地理論所以建置之意義，也便不能只是考其表層所言，且更當對其內部所隱蔽的、那些更具撰者主觀（subjectivity）意向的東西而加以探蹟，如此，它朝治政而在之積極性乃可能獲得揭顯、獲得落實。以上是為本文探論《淮南》地理論所採取的基本觀解方式，而它指向於追索地理論所欲傳達之價值理念及其相繫而來之治道邏輯。

最後可更注意者為目標範圍的問題：原初，本文僅將討論對象聚焦於〈地形〉內部，唯隨著追探益深，筆者發見《淮南》地理論在出離〈地形〉的篇章範圍後，實存在有二型差異型態的地理觀，此姑名之作「理序地理」（order geography）與「渾沌地理」（chaos geography）。這於是導致本文在探論範圍上需再有所擴展以保障追探的全面性與完全性。

循此，本文之探論次第如下：首先，界定並闡明《淮南》二種地理說之各自特質。其次，追索《淮南》建立此二種地理說之原因、二型地理說之關係，及其背後所蘊存之治道蘊向。最末，以《淮南》地理論的代表性觀點「九州八

10 漢·班固，《漢書》，頁4243-4244。

11 劉笑敢，《老子古今：五種對勘與析評引論（修訂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頁311。

12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頁2173。

13 段義孚（Yi-Fu Tuan）撰，王志標譯，《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頁80。

極說」為主要對象，分析其所寓藏之王政理念。就此三部分，冀能具體接引《淮南》地理論向現實性而落實，發見它與王政實踐間之連結關係。下試論之。

二、《淮南》二型地理圖式旨要

《淮南》內部分別存在有二種地理圖式，一為《淮南》地理論之大宗，為「理序型地理圖式」，主要見諸〈地形〉、〈時則〉；一為小宗，為「渾沌型地理圖式」，主要見諸〈俶真〉、〈本經〉。底下先敘《淮南》理序型地理旨要，次論渾沌型地理，以區別二型地理圖式於《淮南》中之主次及其內容之殊異性。

（一）理序型地理圖式

「理序型地理圖式」為《淮南》地理論之主型態。所謂理序，非指由人後天所建置之人為秩序(human order)、也不指大地本身的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物理秩序(physical order)，而指大地先天即呈現之能範圍一切存有者、也指引人間行事運作模式的神聖秩序(divine order)或形上理則(metaphysical order)。¹⁴故理序地理不唯開展大地作一秩序空間、同時也開展之作一意義空間；其地景格局與運作模式故皆即反映著存在於宇宙間之超越律序，而別異於物理性之大自然(nature)。

如〈地形〉云：

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¹⁵

九州、八極二概念於先秦俱已出現。「九州」說見諸《尚書·禹貢》、《周禮·職方氏》、《爾雅·釋地》、《史記·孟荀列傳》等書，而內涵各有異同。「八極」說則於先秦多只為對大地之遼闊空間的泛稱，指八方極遠之地。¹⁶而至《淮

14 關於形上的、超驗的律序與物理的、經驗的律序之別，可參馮耀明，〈論所謂中國古代的自然主義——評李約瑟的觀點〉，楊儒賓編，《自然概念史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381-410。

15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頁437。

16 如《莊子·田子方》：「夫至人者，上闢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清·郭慶藩集釋，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725。又《荀子·解蔽》：「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清·王先謙集解，沈

南》，則建「九州八極」為一呈九宮布列的系統化之廣大空間。對此，後文（第四節）仍將細析，此處姑不備論。

相對於九州八極之為幻構，九山、九塞、九藪、八風、六水則為真實存在之地景。倘就此名山川澤之現實分布論，其所在約以今之晉、陝、豫為中心，而遠達冀、魯、浙一帶，即華北地區為主體；¹⁷然而有意思的是，彼時無論漢廷勢力所及，或僅華北內部，實際山川地景皆不僅如此，山川數量更不呈律序化之分布，此故顯現《淮南》地理記述與客觀地理間具高度之落差。此種落差的形成，後設而論，不當辨識為是〈地形〉撰者的所獲地理訊息不足或經驗質測能力低落，而當辨識為是，思想家意在表呈大地名山川澤的布列即昭示著宇宙間之神聖數值之奧秘。¹⁸於此，故大地並非意義零度之大地，而是與宇宙神聖性合而為一的大地，而生存繁衍於其中之各類存有者，也便可謂是存處於一神聖空間之中，而能受此律序所保護與指引。

關於理序型地理中所設想的「地／人連結」或「空間」指引「行動」的運作模式，〈時則〉論「五位」時有明確表明。它依五方以定方域，除記五方之地的地域特徵、國家民族，並進而亦載述各地之教令原則，開展為一甚見特殊之「地理——政治」說。原文甚長，然觀念結構基本一致，故底下但錄東、南二位以括其餘：

五位：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東至日出之次，搏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太皞、句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

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397。李零解釋該種作為地理空間而說的「極」之概念為一種「視野範圍」的表達，云：「古人把觀察者的眼睛所在是為一種『極』（端的意思），而把他由近及遠望出去的眼界範圍是為另一種『極』，稱為『四極』，所以『四位』同時也是『五位』，『八位』同時也是『九位』。」觀點可備一說。見李零，〈中國古代地理的大視野〉，《中國方術續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196。

17 參高麗珍，《淮南子神話與古代地理知識》（臺中：白象文化事業公司，2020），頁118-120。

18 當把〈天文〉比較於〈地形〉，前者所展示的質測之輝煌成績，即可證〈地形〉的強烈幻設性地理設置，不當是《淮南》撰者群之質測能力的不足之問題，而更可能乃撰者群對地理自始即未思向細緻的質測理念而傾靠。關於《淮南》於天文學上之成就，可參陶磊，《〈淮南子·天文〉研究：從數術史的角度》（濟南：齊魯書社，2003）。

挺羣禁，開閉闔，通窮室，達障塞，行優游，棄怨惡，解役罪，免憂患，休罰刑，開關梁，宣出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貫顓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救飢渴，舉力農，振貧窮，惠孤寡，憂疲疾，出大祿，行大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

中央之極，……¹⁹

《淮南》所架之理序型地理圖式，泰半皆本五行觀念為核心貞定其方域之根本徵性，此五位說並不例外。然除五行屬性外，五位說更將屬於時間之律序帶入，以作為空間律序建置之依據，於是原本不易顯現秩序徵象的空間，也呈現作如時間般之顯明律序性。如五位所在，各自方廣萬二千里，正合一歲十二月之數；同時，五方各有其因五行屬性而立之政教系統，此更乃轉移〈月令〉「務時寄政」的教令觀以成「依位建政」的措政體系；另者，太皞、句芒、赤帝、祝融……等在〈月令〉中之時令神，亦轉而成為方位神，以指示並保障各方域之政令施行允切於特定方域空間神聖屬性。五位作為一種地／人連結狀態的展示，正表現《淮南》理序型地理圖式建置的核心精神：空間即是秩序。

空間因帶律序性、是出律則者，故理序地理圖式同時展示自身作一光明、穩定之詩性意象，而成為存有者所祈仰奉循之存在。《淮南》於架立起該型圖式後，更進一步所強調者故為「俯取度於地」、「俯視地理，以制度量」（〈泰族〉，頁 2098），重視法地、因循地道以作為安置人間理則之施行憑依。要者，此地理圖式所描構者既為大地圖景，同時又為形上律序，而表呈在高度規律性的地景分布與地域運作屬性中，它異於對自然人文地景進行客觀描構的一般地理說。

（二）渾沌型地理圖式

「渾沌型地理圖式」為《淮南》所立之別於理序圖式外的另型空間體系。相對於前者，此之作為一地理論，在《淮南》中缺乏全面性之論述，僅零散語及；不過就其作為《淮南》地／人關懷中所帶出之空間想像而論，所被寄寓之價值理念與意義指向的重要程度，固不下於理序型地理圖式所給出者，故成為《淮南》地理論中未可輕忽的一系。

渾沌型地理圖式的關鍵記述見諸〈俶真〉：

19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頁 626。

至德之世，甘暝於溷濶之域，而徙倚於汗漫之宇。提挈天地而委萬物，以鴻濛為景柱，而浮揚乎無畛之際。……當此之時，莫之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旁薄為一，而萬物大優。²⁰

別異於九州八極中之定數山川地景，《淮南》於〈俶真〉另建了一空間型態，曰「溷濶之域」、「汗漫之宇」。何謂溷濶汗漫？溷，《說文·水部》：「亂也。一曰水濁貌」；²¹濶，高誘注：「言無垠虛之貌」；²²馬宗霍注：「汗漫，廣大無涯涘之貌」。²³綜此，所謂溷濶之域汗漫之宇即指渾茫而廣袤之空間。不過，這僅可視作一表層理解，其更屬深層之意蘊毋寧在展示一空間型態的非理性性、闇晦性，此旨正藏諸溷、濶、汗、漫本身的內在底蘊。

溷、濶、汗漫皆俱水部字彙，運用水意象來表徵宇宙之初期變化或道之徵性，於晚周、秦、漢道家之論中常可見及，如《淮南·原道》狀道云：「混混汨汨」、「甚淖而溷」；²⁴〈太一生水〉云：「大一生水，水反輔大一，是以成天」²⁵等俱是。²⁶〈俶真〉藉由水部字彙描構至德之世所顯之居存空間，該空間自是道之空間化體現。然尤可注意者，其中之水意象既乏澄澈性、亦乏明照性，相反，它為濁亂、為穢污，²⁷故溷濶之域、汗漫之宇所表呈者非一太平清朗空間，而正為一鬱濕倉熱而汗漫無垠之處所，亟顯幽深晦惡景象。不過，該空間並不帶來死亡，反之，它是人之所能獲得「甘暝」、「徙倚」自在優游之至上安宅。故其黑暗乃指向光明、死亡乃指向新生、混亂乃指向律序，終呈黃泉意象與樂園意象的弔詭統合。即此，溷濶汗漫作為一居存空間所顯現的惡劣可佈徵象，

20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頁 224。

21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增修版）》（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2003），頁 555。

22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頁 229。

23 同上註。

24 同上註，頁 1。

25 荊門市博物館編著，《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頁 123。

26 楊儒賓〈創生、深奧與消融：水的原型象徵〉一文對水在先秦思想的意義蘊涵作有廣博發揮，可與參看。楊儒賓，《五行原論：先秦思想的大初存有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8），頁 239-289。

27 「溷」除是濁水，同時也指糞溺髒污，《釋名·釋宮室·廁》：「或曰溷，言溷濁也。」漢·劉熙撰，清·王先謙疏證，《釋名疏證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頁 282。而汗，《說文·水部》：「身液也。」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增修版）》，頁 570。

也即非一般相對於「理序空間」(order space)下所說之「混亂空間」(out of order space)，而是「原初空間」(original space)之展現；渾沌型地理圖式實際即存有者的最屬始源的居存所在——母體、子宮、羊水意象的地理化表出，是人對己之原初記憶的描構。²⁸

此原初空間內部的理序性，《淮南》以「以鴻濛為景柱」喻示之。鴻濛，《事類賦》引《帝系譜》：「天地初起，溟涬鴻濛。」²⁹《子華子·執中》：「渾淪鴻濛，道之所以為宗也。」³⁰字又作瀕濛，《淮南·精神》：「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窈窈冥冥，芒芑漠閔，瀕濛鴻洞。」³¹是鴻濛乃狀宇宙初運、元氣未分之象狀，鴻濛即渾沌。景柱，乃圭表，為測日定時之表柱，引申指標準、律序。故「以鴻濛為景柱」，是指以渾沌為律序，渾沌即理序，亦即「無序」。然則此無序非為理序之喪失，而為理序之未蒙，故它乃是始原理序、是至序無序之序、是絕對律序。

作為無序的、渾沌的地理，就其空間顯像而論，它應當被理解作：並非指有一客觀上不存在任何物景與理則之處所，而指一切地景及其內部理則作為一一可以分立之獨在，其個別徵性並未經由居處其中之存有者所加以辨析、昭示、突顯。實則，此亦正乃地／人守於相與浸潤涵容的一體渾全之中之表徵，故大地雖有其絢爛豐繁，然其作為一一體物之形性、律序與意義，猶尚向人而存守斂藏，它所向居存者而綻顯者、居存者所能辨識者，僅為一「純粹之空間性」(pure spatiality)。故〈俶真〉狀處於此安宅之人之情態曰：「不知東西」、「茫茫沆沆」、³²「忘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毀，中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³³皆乃所以表地／人之際的無對而冥一之居存體驗。

即此為論，此原初空間或渾沌地理圖式，也正呈現為一無度可取、無則可法之大地，此為其所差別於理序型地理圖式之處。雖然如此，但它又乃最屬整全圓滿之大地，是萬有共榮共在相與同流暢遊之大地。

28 關於《淮南》宇宙神話的解讀，可參吉瑞德(N. J. Girargot)撰，蔡覺敏譯，〈《淮南子》和《列子》中的宇宙演化和設想〉，《早期道教的混沌神話及其象徵意義》(濟南：齊魯書社，2017)，頁177-202。

29 宋·吳淑撰注，冀勤、王秀梅、馬蓉校點，《事類賦注·天部一》(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1。

30 晉·程本撰，《子華子》，元·陶宗儀輯，張宗祥重校，《說郛》，方勇編纂，《子藏·道家部·子華子卷》第3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頁5。

31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頁729。

32 同上註，頁165。

33 同上註，頁182。

以上略敘出現於《淮南》中之二型地理圖式。作為二者差異乃至對立之關鍵，在於理序型地理架立一以秩序為核心的空間觀，該秩序既顯之於地景之分布，也深植向大地之運作理則，它並同時指引著人間律序之運轉。相對而言，渾沌地理則給出一以無序為核心的空間觀，地景消逝、地道冥迹，人與萬有相與冥合、大地無則無序，地／人動息一體。然則，《淮南》緣何而要架建此類幻設性之地理圖式？又何以要立地理圖式作二型開展？二型圖式彼此之關係為何？這不免成為更大之疑問。

三、地理圖式之開建暨其王政蘄向

設若相信〈要略〉所揭而視劉安集團對地道／政道之連結存在積極關懷，那麼對於《淮南》之幻設地理記述，也便不當理解為乃劉安集團對古神話地理略乏自覺的順流承襲，而當理解作是時代意識或該集團之自體意識的直接反映。那麼，將《淮南》地理論置放於同時期地理論之發展脈絡中，就思索其所以建置上論二型地理圖式言，乃成必要條件。

另者，就地理／治政之課題言：無論是何種型態之地理圖式，每一圖式的給出，實際皆顯示著圖式規劃者對於大地的關注焦點，給出一種對待世界之態度，也寓藏著相應之治政態度，反映其核心信仰與價值信念。而這層被深隱著的信仰、信念，便是吾人所當予深入發掘的。

據此，本節將以前文所遺留之問題為起點，一方面追問何以《淮南》要架立理序、渾沌二型地理圖式？二圖式間呈何關連？另一方面追問《淮南》地理圖式背後所蘊藏者究竟乃如何之治政方向？蘄向於如何之王政理想？嘗試為《淮南》地理圖式之置立的現實意義、輔政意義提供一種可能的解釋觀點。

（一）表象型地理圖式之盛起及其王政理念

1. 日漸盛起的表象型地理圖式

戰國、秦、漢以降，隨著列國兼併、國土擴張、商業繁盛等各項原因，往來交通之便，擴大了人們慣習之居存空間，也加深了人對於大地之認識，由是一方面帶來視野的推拓，另一方面也帶來地理研考的進展。故戰國中期以後，奠基向經驗質測的、務實性的地理觀逐漸崛起，它著重針對大地表面所呈、可藉經驗觀察而得之象狀及機能，進行如其所顯、如人所見之客觀化記錄；對此，我們不妨名之作「表象地理」（appearance geography）。

秦、漢表象型地理圖式，儘管相對於後世地理學之紀實、精詳程度都尚呈

幼稚，未臻成熟，³⁴但其顯示為一股新的對於世界的認識勢力，逐漸襲捲於知識人的視界與思維觀念之中，若《尚書·禹貢》、《管子》內部之地理論、司馬遷《史記·河渠書》、揚雄《十二州箴》、班固《漢書》〈地理志〉〈溝洫志〉、佚名《尚書地說》等，俱其代表。

同時，作為治政利用面所倚重之地理理論，相較於其於類型，表象型地理圖式亦最屬大宗，此徵諸《周禮》所載與地政相關之官吏職司即可確認，³⁵略舉如次：

六官	職官	職掌
天官冢宰	小宰	聽閭里以版圖。 ³⁶
地官司徒	大司徒	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 ³⁷

34 晉裴秀即嘗據於嚴謹的質測立場，批判三代、秦、漢地理學開展成績之不足，云：「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祕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與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粗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並另提出「製圖之體」六端：「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唐·房玄齡等撰，楊家駱主編，〈裴秀傳〉，《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頁1039、1040。

35 《周禮》官制，據錢穆考，當晚周大儒斟酌古禮以更作推設之理想模型，並非周官實錄。然則，倘自漢儒言古不能不兼參三《禮》，王莽、王安石改制變法首尚《周官》等現象，那麼仍可徵見此書所記有其高度之現實性格。因此意欲辨見周秦之社會、政治運作景狀，此書仍深具參考價值。錢氏之說見錢穆，〈周官著作時代考〉，《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頁279-449。

36 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周禮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刊本），卷3，頁44上。

37 同上註，卷10，頁149上-150上。

夏官司馬	草人	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 ³⁸
	誦訓	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則夾王車。 ³⁹
	職方氏	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 ⁴⁰
	土方氏	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則樹王舍。 ⁴¹
	司險	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 ⁴²
	形方氏	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⁴³
	山師	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⁴⁴
	川師	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⁴⁵
	邊師	掌四方之地名，辨其兵陵、墳衍、邊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 ⁴⁶

除《周禮》所載外，此種現象亦反映於出土文物中，如：1986年，甘肅天水放馬灘秦墓出土繪製於松木板上的包括地形、行政區域、物產分布、森林分

38 同上註，卷16，頁246上。

39 同上註，頁247下。

40 同上註，卷33，頁498上-498下。

41 同上註，頁503上-503下。

42 同上註，卷30，頁549下。

43 同上註，卷33，頁504上。

44 同上註，頁504下。

45 同上註。

46 同上註。

布等的戰國地圖七幅；⁴⁷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城邑圖》、《地形圖》、《駐軍圖》等三件地圖。⁴⁸顯見，表象型地理圖式作為治政之輔翼，乃各型地理圖式中最居主位者。蓋表象地理對於客觀性的著重，成為人利用以有效解決小至穿衣吃食、大至封土建邦等種種現實問題之憑藉；相應的，這故也令表象地理獲得了高度的現實性之存在定位，成為相對於神話地理而漸見興盛的一系地理論。

藉由人對大地的表象記錄分析，大地之種種特徵、機能、理則、富藏等，被逐步發見展列，整體大地成為靜待人們予之更深廣發掘利用及增進知見的巨大寶庫，維繫社會與國家的穩健開展。

不過，就另外一角度言，表象地理作為一套觀物模式，也讓大地之存在性轉而成為資源（resources）、成為了生產者（producer），隔斷人與地之間的親近性，造成地／人關係趨向於難可復返的扭曲變形。

2. 斷裂性的地／人關係及其背後所蘊藏之宰制性

戰國時期，緣總體社會追求富強之意識日見熾烈，故表象地理所揭示的大地形貌，越益受到重視，成為時人在認識周遭世界之過程中的重要憑藉。彼時越是傾向於運用表象地理來觀察環境、覺視世界者，所呈之現象就今日來看，越是屬於現實性乃至功利性濃重之思想學派，如儒、法、兵、農等各家俱是。所差異者，唯部分學派猶保有在表象地理觀外的對大地的他種關懷，如儒家；而有些則基本上只即表象地理觀來觀照大地，如法家。

對該時奉持表象地理之思想家、治人者而言，土地往往不唯是土地，而更是人的所對之物資，既是經濟資產、也是政治資產。大地之價值，即在它所能提供予邦國的富強程度之強弱中體現；而於各種評估標準中，經濟產能又乃最屬顯明者。故大地隨其經濟產值之高低，因而可被估算、被分等、被交易、被代換。如《管子·乘馬·地里》即云：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

47 何雙全，〈天水放馬灘秦墓出土地圖初探〉，《文物》1989年第2期，頁12-25。曹婉如，〈有關天水放馬灘秦墓出土地圖的幾個問題〉，《文物》1989年第12期，頁78-85。

48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地圖的整理〉，《文物》1975年第2期，頁35-45。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駐軍圖整理簡報〉，《文物》1976年第1期，頁19-26。

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⁴⁹

此謂，依據所能養濟定額人口數的土地面積之小大，可判定一地之價值高低：八十平方里的上地，其價值等於百平方里之中地、等於百二十平方里之下地。大地奠基在其所能對人提供的效益程度乃得獲取相應的價值。

同樣的，《管子·八觀》云：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蓄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殖也，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閉貨之門也。故曰：時貨不遂，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⁵⁰

此要在講論貧富之國之差異。認為二種邦國之別，奠基在治人者能否據有豐足之自然資源以及對該類資源進行有效之管理控握。《管子》強調，大地須受養護，且該種養護必須透過政治力的介入來加以保障，換言之，治人者需建立有效之人間律序來保障自然律序。

然則值得注意的是，此層人間律序之建置乃在向國之貧／富之目的而服務，大地之意義由是坐落向貨財之生產者：山澤之存在意義在於出草木、壤地之存在意義在於植桑麻、薦草之存在意義在於養六畜。因此，被保障者並非大地之自然律序之當身，而在自然律序之有資於國富的一層。大地是被重視的，但乃在它之作為人的可利用資源的一面而受重。由是，就另一層面言，大地之作為其自身之本來樣貌又可說實際上並未真正被予以敬謹對待；地景分布之原始格局，如：山脈所盤、林地所據、藪澤所布、平土所位、壤地肥脊……等，都在特定之標準框架下被加以裁審、建立其優劣高低；而人間律序所介入維護之對象，主要即部分能符合於特定標準的方域，至於不合標準者則必須予以改進、予以變造，或即予以拋卻。如《商君書》立「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云：

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二，良田處什四。以此食作夫五萬，其山陵、藪澤、

49 黎翔鳳校注，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104。

50 同上註，頁258-259。

谿谷可以給其材，都邑、蹊道足以處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⁵¹

此即是訂立出特定空間內的山川藪澤土田道路之分布定數之標準，案該種標準而分布之大地，方乃大地之「理想格局」、為治人者所當予尋取並維護之格局。地理空間總是被精算的，被分割裁劃成各種能夠提供殊異效益的資源而認識與利用的。

既是建立於「對人能形構為效益」乃始具有價值，因此，大地的存在之自身，又可說往往是無任何積極價值之展現的，或者說，它之積極價值總是居處隱位；必須等待人的進入參贊、開鑿，其價值始能朗現出來。因此，即令再能符合「理想格局」的地理空間，當其未能被參贊而轉出具體資源，那麼它仍舊形同於存在意義的匱乏，亦即此時的大地並不異於產能耗盡的大地，同歸於價值的失落。此種觀念，正可由商鞅之論徠民中而側見：

周軍之勝，華軍之勝，秦斬首而東之。東之無益亦明矣，而吏猶以為大功，為其損敵也。今以草茅之地徠三晉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損敵也與戰勝同實，而秦得之以為粟，此反行兩登之計也。⁵²

此本是商鞅奠基於秦國地廣人稀、三晉地狹人稠的客觀條件下而提出的徠民政策，即透過招引三晉之民入秦以開土闢荒，轉原初草茅之地以成能提供經濟產值的出粟之所，以厚植秦國國力。其中，商鞅向大地所投予之思考模式，正是將大地視為待開發者；由是大地的價值不在其本來面目，而在與人的際會、得人的參與其中乃始呈出。

總要而論，對於多數之執守於表象型地理圖式者而言，每個地理空間都是靜默的等待者，等待著被人的進入參贊、予以開發，大地在藉由人的向其深探中，獲取其作為蘊藏著豐富之可利用資源的存在之意義性。

由是可見，重視表象型地理圖式者也重視律序，不過其所向之律序不同於理序型地理圖式。對於表象地理的構置者而言，大地之空間律序只是一自然規律（natural order），而描構自然規律的目的，乃是為求人文理序（human order, social order）的有效建立；換言之，表象地理本身所蘊藏之律序性並非人文理

51 蔣禮鴻注，〈徠民〉，《商君書雜指》（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86-87。

52 同上註，頁 93。

序，故它之在人文理序之框架中又可謂是無序；⁵³那麼，整個表象地理圖式的建立意向，也即呈一「指向理序性」。而「指向理序」之實際目的乃為：以人、以邦國為本位的對於大地的有效控作；藉由掌握大自然及其運作規律，而建立起人文世界及其內在律序的穩健模型。箇中之典範表述，可藉荀子《天論》之言表之：「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⁵⁴大地之理序只有自然規律，人藉由掌握、利用及控作自然規律，而建立起更為穩健之人文理序。

以此，故就地／人關係言，蘊藏於表象型地理圖式下之地／人關係乃是一斷裂性、對立性之格局：人分離於大地，要向大地而征服、而攫取、而宰制；大地則作為一人類文明開建的阻力而存在。當阻力被克服，大地於是亡失其本然存在的整全性，轉而只對顯示它之作為資源的意義。

貫串於此種地／人關係之基礎思維，是人向大地的宰控意識、征服意識。而作為該種地理觀的詩意圖象，可舉《詩經·大雅·緜》以表之：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55

它既表徵著人對黑暗大地帶予明光、律序化原始之蠻荒世界，同時也表徵一種控作與征服之力量的進行；而該種宰控意識在王政運作面向的落實，也即著重治人者之自我本位的（self-centered）、以之為中心的大有為之治。自我本位下之控作意識，將周遭世界之他者俱辨認為對象、為工具、為資源，而架立起以我為中心的世界觀。

53 此「無序」並非如在渾沌空間內所顯之「無序」之作為絕對性的「原初理序」，而是相對於「秩序」而說的「無序」，亦即它是混亂、是形下層次的「失序」。

54 分見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頁311、317。

55 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毛詩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刊本），卷16，頁545下-547下。

（二）批判的地理學——渾沌地理說與地人冥一、無政之政

理解戰國以降至於秦、漢，治人者於地理論面向上的遞漸開展趨向，則《淮南》架立起二型地理圖式的意義，可以概略窺得。

雖《淮南》地理論乃以理序地理為主調，然就出現之先後次第言，渾沌型地理圖式實更為先在，⁵⁶且作為上古「至德之世」地理觀之表徵而被提出，故無論於建置之意義上、或在價值之高度上，它的出現都頗耐人尋味，當先予注意。

渾沌地理圖式之特殊性，不唯首先表現在它是與表象地理圖式為最顯對立者，其次表現在它與眾人之經驗覺知具高度違逆性，第三更表現在它乃地理論之對其自身之悖反，它以「抹平地理」來「展現地理」——（奠基在人之解消其自我本位、解消其主體性之基礎上，）既消泯大地豐繁的山川景象（大地文理）、也解去大地的基本律序（大地理理），於是「地理」回歸到純粹之「空間性」自身。然而，正是在該種「地理的自我弔詭」中，渾沌型地理圖式於是向普遍經驗中之地理觀拉開批判性，成為一「批判的」的地理論。而其所批判之對象，主要即是奠基於自我中心（self-centered）、乃至人文本位（human-oriented）價值信念所開展之表象型地理觀——將大地視為客體對象（object），並進而轉作人之利用資源的地理觀。

〈本經〉云：

逮至衰世，鑄山石，鐸金玉，撻蚌蜃，消銅鐵，而萬物不滋；剝胎殺夭，麒麟不游，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鑽燧取火，構木為臺，焚林而田，竭澤而漁，人械不足，畜藏有餘；而萬物不繁兆，萌牙卵胎而不成者，處之太半矣。積壤而丘處，糞田而種穀，掘地而井飲，疏川而為利，築城而為固，拘獸以為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敘，雷霆毀折，電霰降虐，氛霧霜雪不霽，而萬物焦夭。蓄榛穢，聚埽畝，芟野莠，長苗秀，草木之句萌、銜華、戴實而死者不可勝數。⁵⁷

如果說表象型地理圖式所佈展之世界，表徵著人的向其自身之相對於萬有而具之獨特性的貞定——貞定以「文明性」作為「人之所以為人」的存在特徵，那麼渾沌型地理圖式則要讓人的該種存在徵性，不具有向萬有而突出、凌駕其上

56 於《淮南》，渾沌型地理圖式於卷二〈俶真〉先被提起，其後卷三〈天文〉、卷四〈地形〉、卷五〈時則〉乃逐漸架構起理序型地理圖式。

57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頁815。

的特殊權力。外此，它更要向人之作為存有者與他類存有者間之共通性、相容性的一面，予以突顯，藉以淡化並降低文明性在人之開展其自身之存在時的重要程度。

可指，對《淮南》而言，淡化、乃至一定程度的解消文明性作為人之存在性定位，有其必要。蓋文明性的開展，鮮有不以向大地而凌駕侵削為條件者：人之造為金城，而山石幹木毀；人之闢為土田，而草木鳥獸亡；故文明之開展於終境上總指向對他者之宰制，且文明性越是向精緻處遞進，所積澱之危險性即越難究竟，故〈本經〉云：「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⁵⁸揭示了文明性原初所被寄予的是人對自身群體的穩健發展，但它實際所帶來的，則更有人與一切存有者之間之原初關係的裂解與崩離。⁵⁹

質言之，文明性以其帶有正反雙面效應——在人而言之文明，同時即為對他類存有者而顯之野蠻；因此，將文明性做為人之存在性而貞定，不免同時是意向於將暴力侵削作為一價值體系而認可，而確立一種對外之宰制性以成人之存在特質。故渾沌型地理圖式之架建，正在藉由一種反於常識的、對常態經驗下之地／人關係模式的挑戰、顛覆與破毀，引起人對於與他者、與世界、與大地的另型關係模式的重新省思；建立（或復歸）於人／地之間，或我／他之際的「非宰制性」關係，或「出離文明性」之關係。

至〈本經〉云：

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當此之時，無慶賞之利、刑罰之威，禮義廉恥不設，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猶在于混冥之中。⁶⁰

是更即「同氣於天地」以取代「文明性」來作為人之存在性之貞定；由是，「人」或「我」之作為相對於他者、世界、大地的崇高性、獨立性，乃於該種「同氣」意識的開展中被融釋、解消。由之，「優游」成為一種新型之關係模式取替了「宰制」，而「人」或「我」在游於世、融於世，乃至同於世之存在中，抵於

58 同上註，頁 841。

59 關於《淮南》所論人與萬有的原初關係，可參李慶豪，〈「本始關係」的遺落與復歸：《淮南子》感應論略探〉，《淡江中文學報》第 40 期（2019 年 6 月），頁 295-328。

60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頁 833。

存在真性、宇宙性之全盤的伸敞展開；此是為渾沌、是為元初、是為人／地、我／他的融溶無分。在個體而言，此謂之自得，〈原道〉云：「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為一矣。」⁶¹在關係而言，此顯為無傷，〈本經〉云：「昔容成之時，道路鴈行列處，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晦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蹠，而不知其所由然。」⁶²

就秩序性而言，渾沌型地理圖式作為一種為古之人、同時也即真人、宇宙人（cosmic man）所體契之世界樣貌，顯示為「純粹之空間性」、為「理序的隱蔽」，故〈俶真〉又名之作「滅亡之野」，⁶³亦即《莊子》所謂的「无何有之鄉」；⁶⁴表此大地無有資源可採、亦無有律度可循。然則，此非是大地之資源、律度、一切可用性之實際匱乏；相反，此際乃葆見了大地之最屬豐繁圓滿之體相，為理序之整全、意義之整全、資源之整全、可用性之整全……總體渾全性的具體朗現。故渾沌地理中之地／人實相，乃是世界無序而有序、有序而冥迹；古之人行序而不知序、不知序而與天下無傷，故〈俶真〉表之云：

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神氣不蕩于外，萬物恬漠以愉靜，撓槍衡杓之氣，莫不彌靡，而不能為害。當此之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而游，鼓腹而熙，交被天和，食于地德，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沆沆，是謂大治。⁶⁵

天和所覆、地德所養，猖狂遊逸，無識東西；故人向大地顯示為嬰孩，而大地向人而顯示為混冥，地／人同流而共在、互成而冥一。真人泯智，保障的大地整全而豐盈；大地豐盈，保障了真人優游而愉靜。此所以為至為美善之地／人關係。

該種人對大地的冥一意識，當其轉而向王政理念處落實，即為無為之治、乃至無政之政的展開，治人者若存若亡，而百姓自然；制度規矩無所立施，而天下艾安。〈俶真〉云：「於是在上位者，左右而在之，毋淫其性；鎮撫而有

61 同上註，頁 123。

62 同上註，頁 842。

63 同上註，頁 212。

64 清·郭慶藩，〈逍遙遊〉，《莊子集釋》，頁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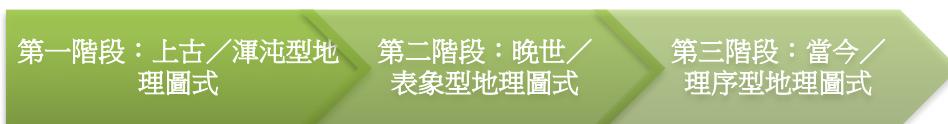
65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頁 165。

之，毋遷其德。是故仁義不布而萬物蕃殖，賞罰不施而天下賓服。」⁶⁶「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群生莫不顙顙然仰其德以和順。」⁶⁷治人者解消自我本位、解構自我中心，無有度制、無有賊心，於是世界將回歸它最本初之大美狀態。

（三）調容折衷——理序地理說與法地遵度、循道立政

假若如上所指，《淮南》置立渾沌型地理圖式，乃是對七雄以降，表象型地理圖式暨其所挾帶之宰制意識漸成社會上之知識風息之批判；那麼，由其所架立之另型地理圖式：理序地理，其意義又向何處坐落？再者，吾人當如何理解於《淮南》內部所顯之二型地理圖式的衝突對立？

倘即上文《淮南》置渾沌型地理圖式於古之世、置文明開展於晚近之世的論述結構而觀，不難發見它之地理論的提出，實際正與其歷史哲學之基本架構相嵌合；⁶⁸那麼可指，理序型地理圖式作為《淮南》地理論的主體，也便是相應於它對「歷史——現實」之關懷而置立的了，更具體的說，是向漢家天下之開建而置立的。且簡示其地理論之開展史如下：



圖一 《淮南》所置古今地理論之開展情勢簡示

即此可明，《淮南》所立「渾沌」、「理序」二型地理圖式，並非立基價值主張上的二種矛盾抉擇，而是立基歷史認識下的對不同時期之地理開展狀況之「描構」（depict）乃至「蘄向」（expect）。我們說它不只是描構、且也是蘄向，是因此二型地理圖式都具有一應然性格，並非真是對過往歷史的如實記述：它們一是存在於上古的渾沌型地理圖式，它被貞定為理當如是：一是存在於當今而向未來開展的理序型地理圖式，它被貞定為應該如此。

66 同上註，頁 165。

67 同上註，頁 224。

68 關於《淮南》之歷史觀，基本俱著力向「文明進化」同時「道德退墮」的雙線格局以做呈現，可於〈俶真〉、〈覽冥〉、〈精神〉、〈本經〉、〈齊俗〉、〈汜論〉、〈泰族〉等篇見及。相關研究可參李增，〈《淮南子》社會進化論〉，《淮南子》（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頁 165-205。另陳靜更自《淮南》宇宙論思想為切入點以分析其史觀的所以構型。可予並參。見陳靜，〈道與宇宙的生成〉，《自由與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4），頁 219-231。

而亦因此，《淮南》所立理序型地理圖式的內部訴求與所蘊蓄之價值理念，成為我們當更加以著意之對象，蓋它乃是《淮南》向歷史開展之第三階段、向七雄嬴秦之後、向繼接大一統新局之劉氏天下而真正設心安置之地理圖式，而挾帶著對現實介入、指導的積極用意。具言之，它之創建，正為有以訴求對理想中之渾沌地理圖式而回應，也對晚近而在之表象地理圖式而回應，以重新發掘地道之體貌、定向地／人之關係，而作漢家王政開展之所法、民人知世行事之所依。

由是，該型地理圖式可指乃以一調容折衷為性格，調容折衷於「理想」與「現實」，其具體表現為：貴尚律序而出離渾沌，但同時又跨逾出表象型地理圖式，亦即不在自然規律或人為秩序層次上說律序，而是自超越的層面，追索向形上律序、神聖律序而冀求。神聖律序於是可謂即是《淮南》所賴以調容折衷——理想／現實、渾沌地理／表象地理、宰制／冥一、有政／無政……等——各對立雙端的主要憑依，故它即理序型地理圖式之核心本體。有神聖理序，乃有理序型地理圖式之可言，否則理序地理即無從得說。

然則，大地何以不只是自然，且也是神聖的？此神聖性，在《淮南》可以說是於世界始肇之時即被命予的了。也就是說，當宇宙生成、當大地始現，那種未經破壞的世界的初始樣態，它本身即蘊存有一種原初的秩序性、一種符合於道的秩序性，而當下即是神聖的。亦即神聖在宇宙生成之過程、在世界初始樣貌之秩序中，體現流佈出來。故〈天文〉云：

道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為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為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為禮，喪紀三踊以為節，兵革三軍以為制。⁶⁹

而〈精神〉云：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窈窈冥冥，芒芟漠閔，瀕濛鴻洞，莫知其門。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於是乃別為陰陽，離為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⁷⁰

69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頁370。

70 同上註，頁729。

神聖性伴隨著宇宙的初始秩序而形現。就大地而言，在「二神混生」、「別為陰陽」後而形現的八極大陸，故同樣也體現著宇宙本初的神聖理序，我們可說，此間所呈現之神聖秩序即是大地的本象。

神聖理序作為大地之本象、超越之真實，同時也是存有者賴以辨定、感知天下是否為在序或失序之衡準，具言之：天下之運作皆循從於此理序，是天下之在序，大地以是安穩；反之，天下之運作其悖離於此理序，是天下之失序，而大地因之動盪。故〈覽冥〉云：

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熒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驚鳥攖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背方州，抱圓天，和春燭夏，殺秋約冬，枕方寢繩。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⁷¹

此所賴以辨定四極之廢、九州之裂、天之不兼覆、地之不周載之衡準，即為神聖理序；女媧之補蒼天、立四極、濟冀州、止淫水，須是依取於神聖理序為之範式，乃有所謂復天地之大序、使天地重新在序之可言。因之，《淮南》不即大禹以說九州，而於禹之先，云大地自具九州。⁷²蓋禹九州為大禹所制，為人為

71 同上註，頁 689。

72 《淮南》九州說別於禹九州，說詳下節。另此間更頗涉及歷史時間與神話時間的交錯問題，於此或可略贅數語：本文認為《淮南》的此一運作，也同時將歷史時間與神話時間會結為一，重新建立起屬其自身的「神話——歷史」觀。而事實上，神話與歷史之分界就其本質而言，往往並未必如一般所見般清晰，其中涉及有歷史記憶的營構之問題。猶黃帝歷史春秋以前無傳，而為田齊所建神話至司馬遷進一步將「薦紳先生難言之」眾多古帝神話重塑為五帝歷史以建立自黃帝而下至漢的帝王譜系，挾官方之勢，該敘事故逐漸成了後世華夏民族對自身文化歷史的典範認知。那麼與司馬遷同時之劉安亦然，面對該時尚未完成典範建置的史前史，其可謂亦在建立屬其自身文化（淮楚文化）的歷史記憶，而《淮南》該種「歷史」之作為想像的，性質正不下於商之簡狄吞卵神話、周之姜原履巨人迹神話，只不過《淮南》此一歷史敘事於後世並未如《史記》所制史前史般被轉成民族之歷史意識所共同承認的「現實」，而是被向神話敘事而貞定罷。於是，作為此一在禹別九州（後世界定它作在歷史時間中之歷史事實）之前的神聖九州、女媧補天，究竟為神話時間抑或歷史時間？便成為值得省思之問題。而至少在《淮南》，由伏羲、女媧以至於黃帝、舜、

之「行政區劃」(administrative division)；而作為大地本象之《淮南》九州，則併天地而俱生，為二神所營之「神聖區劃」(sacred area division)。「行政區劃」其秩序性依諸人為而制，「神聖區劃」其秩序性則在其自身而顯；因此，令大地在序，其終極憑依，在於循其本然之神聖理序，而不在於外此而另予營構或依採於人文理序，殆無所奠基於神聖理序之人文開展，總將世界更帶往以人為中心的對於他者破壞、對大地侵削。

轉就人之行事之宜適問題為言，大地既以天下之無所遮蔽或無所違逆於此神聖律序乃得安穩，那麼人之欲己之居存空間為凝定、為風霆流形庶物露生，也便須當洞察此大地之本象，掌握大地之神聖律序，法地之度而敬順之；而〈地形〉所陳之理序型地理圖式，即可謂乃對大地之神聖律序之細繹，具體呈出了大地之律度、本象、真實面目(true features)，而昭示以人之所當循法。即此，倘就歷史之三階段開展而論其各世之人對此神聖律序之知行，那麼它可謂正呈現為：「古之人」，體序而不知有序；「晚世之人」，不知序而制序(人文之序)以亂序(神聖律序)；至如「當今之人」(漢世之人)，則該要知序、明序而行序、履序。

至此，可指《淮南》理序型地理圖式之架立，乃展現為是向無可復返之冥一性之地／人關係的力求修復，並同時向文明開展之合理性而貞定其基礎維度。它藉由一神聖律序之置立，一方面約束並指引人之文明性的運作，使其不向萬有形成過度之侵毀；另一方面亦再彰大地作為萬有之依存、律則之所出、聖性之自身、意義之豐藏等諸面向。由是，大地故顯現為既為養濟萬有之資源，又是規擬人文的超越性存在。而地／人二端，即於該種人之向大地之神聖性而巳生起的欽畏奉敬之情中，再被帶返於本初的相與諧和之關係中。

作為理序型地理圖式背後之思維指引的，故是一種向大地的欽敬意識，要知所忌諱。⁷³由是，大地真正向人而展現為可取法、而當循法之神聖存在，既不

禹，乃是被建立作於同一歷史發展序列上之各世代，亦即它被辨識為一歷史。故容或我們也即以「歷史時間」來看待它。以上，歷史與神話書寫之相關問題，可參王明珂，《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15)。田齊對黃帝歷史的創造，可參郭沫若，〈稷下黃老學批判〉，《十批判書》(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頁156-191。司馬遷的帝王譜系構建，可參陳靜，〈漢代大一統政治歷史的理論建構〉，馮達文主編，《兩漢思想與信仰》(成都：巴蜀書社，2013)，頁12-18；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撰，葉穎譯，〈中國天下〉，《天下時代：秩序與歷史(卷四)》(南京：譯林出版社，2018)，頁371-403。

73 〈要略〉論〈天文〉、〈地形〉、〈時則〉諸篇之所以撰作云：「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張雙棣，《淮南子校釋》，頁2193

是待人操控宰制之資源，亦不是與人冥一無可識知之存在；此之向王政的落實，故始真正為法地而尊度、循道以立政的一路。

然則關鍵點正在：此由大地所表呈的「度」或「道」（神聖律則），內涵究竟為何？案《淮南》理序型地理圖式之架設，其大地之被營構、理解作呈如此之律序體貌，也正需在它的為治人者而參酌、取度、法循之中，而它之現實意義始獲真正之開展與落實，亦即真正朗現了《淮南》理序型地理圖式作為向治政之道而存在的具體意義。那麼，究竟《淮南》於其理序地理圖式中所寓存之地道之面目究為如何？它指示向怎樣的理想王政格局？下文將進一步以〈地形〉所論「九州八極」說為主要根據進行掘發，以窺一斑。

四、「九州八極」圖式之空間形構暨其王政隱喻

《淮南》所架構起之理序型地理圖式內容豐富，除於〈地形〉有較集中的描構，另也散見於〈天文〉、〈時則〉。然若欲對其總體記述一一進行分析，既太顯繁瑣，對於追索箇中理念言，亦缺乏必要性，蓋《淮南》之地理論不少為對於古舊之說的襲取，對於這類資料，儘管吾人亦可追探其所以襲採的背後思慮，然相對而言，猶比不上直接追索其所自立之地理論，為更能昭明它所蘊向之作為王政所法之格局律度。有鑑於此，且慮及篇幅限制，下文將僅即尤能作為《淮南》地理論之代表的「九州八極」圖式進行分析，以見《淮南》所寄諸地理律度中的王政理想之梗概。下文將分兩部分探討，首先分析九州八極所示大地格局特徵，其次乃嘗試進一步說明其所寓含之王政格局意向。

（一）九州八極圖式之空間形構

〈地形〉云：

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並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⁷⁴

九州之大，純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殛，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無通，曰大澤；⁷⁵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

74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頁437。

75 「曰無通，曰大澤」原作「曰大澤，曰無通」，從俞樾說改。同上註，頁464，注3引。

南方曰大夢，曰浩澤；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凡八殯八澤之雲，是雨九州。

八殯之外，而有八紘（亦方千里）。⁷⁶自東北方曰和丘，曰荒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眾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西南方曰焦僥，曰炎土；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北方曰積冰，曰委羽。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

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閭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殯、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⁷⁷

《淮南》九州八極說相較於晚周之世被提出的各種九州說而言，都是甚為特殊的空間圖式。前文已指出，它被立為乃大地本然之神聖區劃，而非人為之行政區劃。此下，我們將更分就九州八極之：總體空間架構、細部地理特徵、內部機能之運作理則等三部分，進一步梳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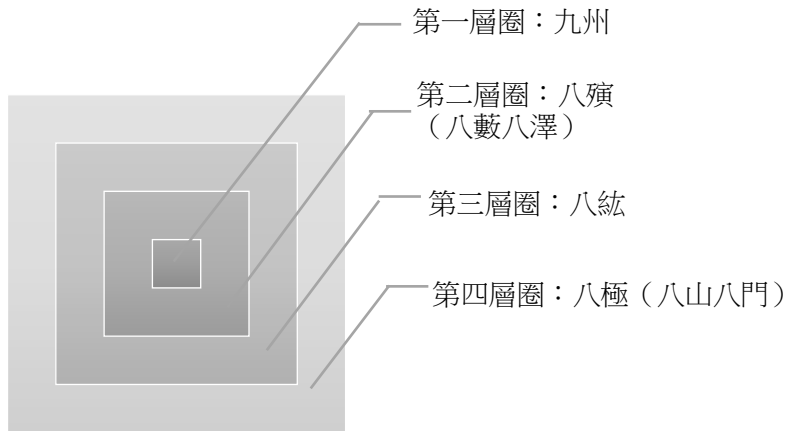
首先，就九州八極空間之大致架構言：它呈九州為如九宮圖之格局（詳圖二），以此格局為基礎，向外逐層擴張，形成四重同心環包之層圈：以中土冀州為中心，朝外，第一層圈為九州、第二層圈為八殯（八藪八澤）、第三層圈為八紘、最外第四層圈為八極（八山八門）。壤土毗連之四大層圈，共成位居四海四極中的巨大陸域（下姑以八極巨陸名之。詳圖三）。既為環層結構，故就面積言，州、殯、紘、極各有差別：「州」為最狹、其上為「殯」、再上為「紘」，至「極」為最廣。雖然，然各層圈之面積各有定數，由內向外呈等比擴張。此是為《淮南》構設之理序型地理圖式下的大地結構。

76 于鬯疑「亦方千里」四字衍；就九州八極之構形推，其說當是。同上註，頁466，注10引。

77 同上註，頁462-463。

東南 神州 農土	正南 次州 沃土	西南 戎州 滔土
正東 陽州 申土	正中 冀州 中土	正西 弇州 並土
東北 薄州 隱土	正北 濟州 成土	西北 台州 肥土

圖二 《淮南》九州格局簡示



圖三 八極巨陸格局簡示

其次，就八極巨陸之細部地理特徵言：雖《淮南》並未對之而有細部描構，不過仍對層圈各方位地域書有地名。以是，吾人故能藉之而略見八極巨陸之方域地景特性。另者，後設而論，既諸地名乃《淮南》所予擬構者，故由這些地名本身之隱喻指向，乃又可以進一步窺見被寓藏於巨陸結構底層的撰者意向乃至其價值信念，因此，《淮南》對巨陸的這些簡略記述，尤其不當輕忽。

案《淮南》對層圈內各方域的命名，主要依於底下四類標準而擬制：宜居性、自然形勢、所存異族、五行屬性。具言之：

1. 依「宜居性」命名：如：農土、沃土、肥土、成土……

根據宜居性，《淮南》將八極巨陸又大致區別作二大層圈，它以九州／八殯之間的分界為區隔，九州界內為宜居之地域，壤土肥沃，利於耕植；八殯以外則宜居性遞漸趨弱；至於八極，更崇山遍布，烈風迅急。

2. 依「自然形勢」命名：如：有滔土、大澤、和丘、方土之山……

《淮南》據自然形勢而將州、殯、紘、極四大層圈的各自地理特性表現出來。大抵九州以平土為主體、八殯以藪澤為主體、八紘以丘陵山野為主體、八極以崇山峻嶺為主體。

3. 依「所居異族」命名：如：眾女、一目。

《淮南》據所居異族，展示了八極巨陸上之智性存在者（人類）的族群多元性，即並不僅有華夏民族存在。⁷⁸這些足以以「族名」即成為「地名」的族群，應當是甚為龐大的、人口眾多的。他們雖不居於九州，但也不居於生活條件嚴苛的八殯藪澤或八極崇山，而主要分布於八紘此相對宜居之處，與九州遙相對望。

4. 依「五行屬性」命名：如：東北蒼門、南方暑門、西南白門、西北幽都之門……

《淮南》據此而貞定各方域之地理特性。值得注意者，越是向外部層圈推進，則各方域的五行屬性即越顯鮮明、特徵越見強烈，至最外層圈之八極，各極依其方位，已幾乎皆與方位所屬之五行屬性相應和；反之，越向內部層圈推進，方域之五行特徵即越見淡薄，及至九州，各州之五行徵性幾已難見。此或可理解為：五行作為影響方域地理的獨特能量，起自巨陸周邊，至於中心，而能量相會而達於均平和調。這種狀況，正猶《淮南》所示巨陸之風雨寒暑之運作理則為同（說詳下文）。

綜此地名所示，嘗試復原此八極巨陸之空間特性，可指其表現為：越趨中心，地土越見肥沃，劇烈的環境特徵（如林藪崇山、方域屬性）越不明顯，各方域之差異屬性趨弱、同質性趨盛，越宜居；反之，越向外部層圈，地貌越見複雜、地土越見貧脊，方域彼此間之差異屬性益見顯明、同質性轉低，越不適於人居。除此自然地景外，八極巨陸亦有異族分布，部分族群聚落或頗廣大，存在於離中心較遠的巨陸邊陲地帶。以上，是為八極巨陸之細部之自然、人文地理特徵。

最後，就八極巨陸內部之機能及其運作理則言：《淮南》以風、雨、寒暑為基本符號來進行說明。略述如次：

78 〈地形〉另載有海外三十六國，然此一記錄不在《淮南》對九州八極的討論脈絡中，且多襲《山海經》之說而來，故姑不具論。

1. 風：

風依方向而有八風之分，起巨陸之外，經巨陸最外層圈八極崇山所形之八大巨門而入內、颳拂過八紘、八殫，最終會於九州中心。案：於八極巨陸中，風既是推進雲雨以潤澤大地的動力源，又是對寒暑變化的節制力量，可謂巨陸環境動態變化的最關鍵機能。

2. 雨：

風不起自巨陸之內，但雨則相反：除九州外，八殫、八紘、八極之雲皆能布雨，以隨八風，因此各層圈之雲雨所施範域亦有不同，即皆自雨、也雨向內部層圈。具言之，由內而外諸層圈之雨露佈施狀況呈：

九州：不自雨，而受八殫、八紘、八極之雨。

八殫：自雨、亦雨九州。

八紘：自雨，亦雨八殫、九州。

八極：自雨、亦雨八紘、八殫、九州。以此，故曰「雨天下」。

3. 寒暑：

寒暑不起於巨陸的最內層圈九州，亦不起於第二層圈八殫，而起自第三層圈八紘。然八紘所出寒暑，更受最外層圈所來之八風所節制，《淮南》云「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八門之風，是節寒暑。」故「合八正」之「合」既指結合、也指符合。「八正」即八風之正，也即八節之氣，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冬至、夏至）、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氣。⁷⁹

以上，倘將風、雨、寒暑視作能量或動力，那麼可指《淮南》所立八極巨陸的能量運作模式乃呈一自內向外逐層遞增之型態：越趨外部環層，所具之能量越大、總體機能亦越見複雜，至八極之外，是「風」之發起，也是能量積蘊的最顯渾厚處；相反，越趨內部環層，自身所具之能量越小，總體機能亦越見單純，至九州以內，而自體能量能量至於無見，而維繫其運作的能量則由外部各層圈所流動不已之能量所會灌充覆，而它則保障各差異性能量的不已湧入，不為致災、不為激烈衝突，而達於均平和調，故九州相對於外部層圈而言，又是消容性層圈、調融性層圈。

以此，故結構的說，八極巨陸中所有在內層圈都向在外層圈顯示為相對靜態，至九州而內（中土冀州）而達於至靜，表現為消容性、調融性；相反，所

79 八正，高注：「八風之正也。」張雙棣，《淮南子校釋》，頁467，注18引。又稱八正之氣，《史記》：「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張守節索隱：「八謂八節之氣，以應八方之風」。漢·司馬遷，《史記》，頁1243。

有在外層圈皆向在內層圈顯現為相對動態，至八極而外（四海四極）而達於至動，表現為動力性、趨內性。此形成九州八極運作機能的基本模式。

（二）九州八極圖式之王政隱喻

藉《淮南》九州八極說之而觀，不難發見該一地理記述並不如表象地理或一般地理學般著重於對各方域地景作詳細描記，而乃著意於營構該地理之內部徵性及其總體運作律序，可見，引觀者以曉知其所居大地之具體情況，並非撰者之主要關懷；他毋寧在藉此地理圖式而將一套律序觀，乃至價值立場而納置於觀者——帝王——之認識觀念中，⁸⁰使內化作其存在之內向指導。於是，到底《淮南》之置九州八極地理圖式所寄附之政道理念為如何？便值得吾人予以究竟。

首先，自八極巨陸的總體空間形構看：此同心外擴的層圈結構，於周秦漢空間觀中並不罕見，如現實中周世都城結構的以城邑為中心，自中心向邊域，呈郊→野→牧的擴延；⁸¹古史中所見王會臺結構的以堂為中心，自中心向邊域，呈內臺→中臺→外臺的擴延；⁸²乃至儒經中所載畿服制結構的以王畿為中心，自中心向邊域，呈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的擴延等，⁸³率皆如此。而其間，空間之分層結構，也同時即是權力的分層結構，它呈現為一權力的向心模式，越靠中心，權力等級越高，反之則權力等級越低。故中心乃為治人者所居，為城邑、為堂、為王畿；邊陲則為治於人者所居，為鄙野、為列臺、為諸服。此並也形成一套固定化之象徵符碼，以代指向君臣、君民、或君與天下之關係，

80 《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淮南》本為劉安上獻漢室的論治之典，故其所預設之主要讀者，即為治人者。漢·班固，《漢書》，頁2145。

81 構相關研究可參劉銘緯、賴光邦，〈中國古代城郭都市型態簡論——坊市革命以前華夏都城型態的聚合、分化與其制度化程序〉，《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16期（2010年12月），頁79-119。

82 王會臺之結構，參《逸周書·王會》所載成周之會事，文繁不具引。清·朱右曾，《逸周書》（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0），卷7，頁1971下-1975下。

83 《尚書》〈酒誥〉〈禹貢〉、《國語·周語》及《周禮》〈地官〉〈秋官〉等皆載有畿服制，或別為內外服、或別為五服、六服、乃至九服，對於諸服之稱名亦各有異同；本文所列者為《尚書·禹貢》五服說。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尚書注疏附校勘記》，頁91下-93下。畿服制在漢代對外關係上的開展，可參余英時撰，陳高華譯，〈漢朝的對外關係〉，英·崔瑞德（Denis Twitchett）、英·魯惟一（Michael Loewe）編，《劍橋中國秦漢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頁356-441。

如《荀子·大略》云：「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⁸⁴《韓非·揚權》云：「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⁸⁵《白虎通·禮樂》：「王者平居中央，制御四方。」⁸⁶而《淮南》所置八極巨陸之「地理層圈」格局，就其作為一社會所共享之文化符碼言，故同時也即一「權力分層」格局；巨陸層圈的由中向外擴延，同時也即權力位序由高向低遞降。

對於八極巨陸的層圈——權力結構，倘必欲在由中心至邊域的各層圈中，安置下它所一一表徵之社會階序，那麼或不妨假設它正表由帝王，至群臣，至士人，至百姓的階層佈列；當然，此種假設並無固定性，蓋作為諸層圈所實際對應的階層指向，《淮南》並無具論；不過，巨陸的由中心向邊陲的外擴形構表徵著一權力位序的遞降結構，則具有隱喻的穩定性。

以上，可謂是《淮南》巨陸圖式之治道隱喻基礎，至其治道理念的真正寄寓，則在其對巨陸之細部地理特徵及運作理則之描構中乃始真正展開。

如前所析，八極巨陸之細部地理徵性，由內層圈向外層圈呈現為：土地的由豐饒而貧脊，方位屬性（五行徵性）的由隱晦而顯明。故最內層圈的九州，州土彼此間的同質性高，個別特性不顯；反之，最外層圈的八極，彼此間的同質性低，各方位空間的獨特屬性顯明。而如此空間構型背後，毋寧可謂深帶道家道器觀之意識：中心層圈「九州」以象道，環外層圈「八殯八紘八極」以象器。道為無形、器為有象，故九州之五行屬性不顯、八極之五行屬性甚明。如此地理圖式同時向治道而給出的隱喻是，君居中央，法九州以平淡；臣居四方，法八殯、八紘、八極以聰明。至漢末三國，劉劭（?-?）的《人物志》之人才擇用理論，更將該系理念作更細緻之發揮。⁸⁷

如果說《淮南》對巨陸各層圈之靜態特徵的描構，喻指的是治人者與治於人者所合當體現之差異氣格，那麼其對巨陸各層圈之動態機能之建置，則表呈了對治人者與治於人者之合當備有之行事律序的根本訴求。

84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頁485。

85 清·王先慎集解，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44。

86 清·陳立疏證，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118。

87 〈九徵〉：「凡人之質，中和最貴矣。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一微謂之依似，依似，亂德之類也。一至一違謂之閒雜，閒雜，無恒之人也。無恒、依似，皆風人末流；末流之質，不可勝論，是以略而不概也。」魏·劉劭，涼·劉昞注，《人物志》（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8），卷上，頁1上-1下、4上。

據前文所指，八極巨陸之運作，呈八方風雨會中州之模式：「九州」本身並不生現能量，其徵性為靜，為能量的接收調融原則；相反，「八殞、八紘、八極」本身為能量的湧現之源，其徵性為動，為能量的升騰輸濟原則。如果說，出現於該圖式中之風、雨、寒暑，正乃為對各權力階層之應然職司之擬喻，那麼其所投射之治政理想範式，故實際可說乃正表呈作一「無為在君、無不為在臣與民」的治政典型。

尤可注意者乃其中的「風」的隱喻。風自八極之外朝內吹拂，達於九州；而如前所指，八極正象喻著社會階序的底層存在（小人），它是在面積（數量）上較中心九州（社會階序的上層存在——君子）更見恢弘廣闊之空間。那麼，「風」作為一種喻示，也正將權力的重心，自中心帶向邊陲，從社會的上層階序帶向了社會下層階序，蓋它們方是能量（權力）的真正給出者；可以指，相較於儒家傳統對風意象的建構：「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⁸⁸，《淮南》則折離了君子與風意象之間的連結，君子於是返諸虛位，不更作為天下的指引者而存在；相反，小人則進而與風意象連結起來，在君子的進入自我虛化當中，風於是能夠開始自主出入、升騰、乃至湧濟向上，而最終帶予君子、帶予君人者以潤澤。⁸⁹

在《淮南》所建的此巨陸圖式中，「能量虛化的中心」與「能量生湧的邊陲」，乃是道家意味極強的隱喻，可以說，正奠基於此種特殊的能量運作模式，於是乃始保證了大地的總體平衡。反言之，設若此中心不能自我虛化，而亦湧現屬於自身之能量，那麼它將無以調節融合自外部層圈所不已流入的殊異動能，進而形成內外層圈之間的彼此壓迫、對抗衝突，終則破毀大地的總體和諧。作為九州八極圖式之喻示核心者，故乃一種無為、虛化之君主觀；正由於君主之能夠無為虛化，於是他保證了臣民的能量的自由開展，也保證了整體政治系統的達於完善整全，而天下臻於大美之境。

88 清·程樹德集釋，程俊英、蔣見元點校，〈顏淵〉，《論語集釋》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866。

89 此種上下之教化關係的逆反性結構，於《莊子》有甚見普遍的開展，如〈大宗師〉之孔子問道顏淵、〈在宥〉之黃帝問道廣成子、〈天地〉之堯問道許由、〈天道〉之堯問道舜等，俱是。《淮南》於莊學多所承採，而〈地形〉此說之營構，或亦受其影響然。另〈主術〉云：「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為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詔，過若毫釐而既已備之也。」（張雙棣，《淮南子校釋》，頁1034。）則更是即諫議制度之推倡，而貞定政治場域上的權力平衡關係，讓下位者於權力結構中的存在角色獲得更顯明的呈出。

《老子》66 章：「聖人欲上民，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必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⁹⁰可謂正《淮南》八極巨陸圖式的基本精神、亦其治道觀本體，此種精神之神話演示，或亦可用《淮南》開篇之二皇治世圖象而表之：

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⁹¹

《淮南》二皇居中央以撫四方的治道開展，乃指向神治天下或游化天下的治道觀。⁹²治人者偕萬化以遨遊、共天地而終始，居中守靜、無為為之；所以如是，乃在治人者自身之轉而化作一「虛化主體」，不顯對外之控作，由是，治人者乃能無所陷於一與他者的對立性中而擺落緊張關係，轉而進入相與優游之境境中。而此種與化優游的境界，也正是向渾沌型地理圖式所昭示的與他者的始原關係而復歸。這樣的「無為在君、有為在臣與民」，故乃與道家所形構之「術化主體」具有根本差別。⁹³後者作為居中者，向外開展作一窺伺性、宰制性，而最終欲要訴求獨尊；而前者作為居中者，則向外開展為任然性、包容性，而最終欲要讓萬有之存在俱得朗現。⁹⁴

90 劉笑敢，《老子古今：五種對勘與析評引論（修訂版）》，頁 667。

91 張雙棣，〈原道〉，《淮南子校釋》，頁 1。

92 該種神化之治，實際也即無治之治、不加介入控作而任物自然之治。《莊子·天道》：「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慄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486。或可視為此說的一脈思想根源。於《淮南》，神化之治乃表一治道的至上型態，〈主術〉云：「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為非，其次賞賢而罰暴。」張雙棣，《淮南子校釋》，頁 924。它基本上即是道家理念的向治政處的開展與落實。

93 此所謂道家，指的是戰國中期以降所興起的一系援道入法之思想學統，廣義而言，申不害、慎到、韓非俱屬之，而上世紀所發掘之馬王堆帛書〈經法〉、〈十大經〉、〈稱〉、〈道原〉等四篇，則可指乃該系思想之代表；學者或以「黃老」名之。

94 術化主體的思想代表，如《管子·心術上》：「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故曰動則失位。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故曰靜乃自得。」黎翔鳳，《管子校注》，頁 767。《鶡冠子·王鈇》：「天子執一以居中央。調以五音，正以六律，紀以度數，宰以刑德。」黃懷信校注，《鶡冠子彙校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187。該種理論也著重強調居中守靜、無為為之的治道模式，但其核心精神乃在尊君、樹

以此，八極巨陸環層的地理結構作為一價值律序之喻示，雖就族群課題論，似若呈現為我族中心論型態；就治政課題論，似若呈現為帝王中心論型態，但該種中心本身又皆實際的朝「虛化之中心」而落實，故而它之居主中央，乃同時保證了周邊層圈、下位階序之存在者其存在性俱能得其充分開展。換言之，其鬆解了「中心」長久所被貞定下之「宰制」性格，而另朝「包容」、「任然」性格而重訂「中心」之意義，於是，九州八極圖式最終指向的並不是對於「中心」的突顯，而是對各層圈俱無可虧缺之「整體」的強調；亦即，它不是如其表層所顯般為一我族中心論、帝王中心論，而乃多元共榮論、整體共榮論。徵之以〈地形〉之述五方之人之特徵，也便可以知曉何以「中央之人」同「四方之人」般，俱見有形性上之虧缺，而不屬完美；⁹⁵其中更帶有向多元平等之價值的肯定。

至此，我們藉由對《淮南》九州八極說的解析，進一步回應了前文所遺留之問題：當《淮南》建立理序型地理圖式而強調法地遵道、依度建政時，它所實際漸向建立的道或度究竟是什麼？本文認為，它之終極目標乃是一對道家之治政典範的落實與回歸；不過就其運作形式言，則是藉由陰陽術數觀念以架建其嚴整繁複的理序框架。⁹⁶換言之，律序化之地理最終所要保障的是渾沌地理中之與化冥一之精神；法度象地的有為活動最終所要保障的是無為為之之治道格局的具體落實。而這樣的一種的地理——治政型態，正是在扣合向當世（漢代）之存在處境中的對渾沌／表象地理圖式的調容與折衷，最終訴求將「至德」保留於當世，同時也立「文明」而不悖於自然。⁹⁷更現實的說，此毋寧也正是《淮

立君王的無上權威，故其對下、對外仍呈一宰制性原則。而無為、守靜、居中乃成為成就帝王的至上存在格局的技術性憑藉。不同於虛化主體所著重的解消宰制、任物自然。

95 東方：「其人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鵠肩企行」。南方：「其人脩形兌上，大口決眦」。西方：「其人方面末僂，脩頸印行」。北方：「其人翕形短頸，大肩下尻」。中央：「其人大面短頸，美須惡肥」。張雙棣，《淮南子校釋》，頁486。

96 部分學者認為〈地形〉為陰陽家之作，如李增，《淮南子哲學思想研究》（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1997），頁33。孫紀文，《淮南子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頁205-220。筆者認為如此的判斷有其合理性，然實際則可再更透徹，即：陰陽家僅是〈地形〉或《淮南》地理說之表層之表現型態，而其內在精神或價值意向，恐仍不離道家。

97 對如此一種調綜精神的道家說，學者或易將之即歸諸黃老道家。唯黃老一詞的背後蘊涵甚為複雜，筆者不認為當前學界對該詞之定義已取得一穩定共識，故為免旁生枝節，乃至令讀者將《淮南》地理論所蘊藏之王政思想即被帶向道家之權謀體系而誤認，故此仍儘梳理其面目，不更就某某道家以予進一步界定。

南》對漢家大一統之政制架構而建的政道導向或政道呼籲，以要求帝王於一由政治體制所保障的集權權利中，同時適度的虛化其自身、鬆解對天下之宰控，而保障天下萬民有其自然運作之空間。

五、結語

本文起於如此疑問：當把具有濃重幻設性之《淮南》地理論置諸同時代作為輔弼治政而設的地理論之列，將可見這樣的論述並不符合時宜。然則，假若信從〈要略〉所言——《淮南》乃奠基於輔弼治用之目的而被撰作，如此之地理論，究竟如何被撰者思索其與治政之連結？

為回應於此，本文故嘗試跨出以往對《淮南》地理論的解讀方向，不再純粹立足於「地理學」視角而視之，而是轉而就「地理思想」之角度而觀之。由是，本文所聚焦的面向乃自追問：《淮南》地理論所記錄的地理內容為如何、它們究竟為真或為假，以及它在地理學史有何成就與定位；進而追問：導致《淮南》提出如此地理論的背後原因是什麼、其核心關懷是什麼，乃若所寄寓其間的王政思索是什麼？此為本文對前人研究在方向上的調整。

同時，筆者也將以往為學者視為屬文學譬喻而未甚予以著重之《淮南》渾沌空間說，同貞定作劉氏地理論的二大類型之一，並著意解析其被建置的背後意義。蓋就作為一被寄寓著重要之價值信念的地理說而言，渾沌空間說之重要性，正不下於常為人所討論的〈地形〉地理說。此是為本文對前人研究在課題上的擴張。

由之，《淮南》地理說就整體形構而言，可說乃是奠基於「渾沌」及「理序」二型地理圖式且同時寄附有價值理念與王政蘄向的一套思想體系；而《淮南》之所以能作如此理論形構，又乃植根於傳統法天則地之共同文化信仰而來。故由此亦可說，《淮南》對其整套地理論之建置，更大之意義並不在揭示地理（大地之自然物景與物理），而在論說地道（大地之人文意涵乃至通天地人而共有之義蘊），乃至論說帝道。以上，是為本文在解讀上的基本假設。

那麼，《淮南》透過其地理論所要建置地為人所法、為帝所法之地道又是什麼？

我們認為，《淮南》二型地理圖式就其終極訴求言，實際具有高度同一性，即俱指向對彼時逐漸興起之表象地理圖式背後所蘊藏之宰制意識而發起批判與反思；而其最終訴求，乃在建置一非宰制性空間、帝王偕化同遊的整體共榮空間，以讓大地、萬有、天下、他者、民人百姓……等，皆於此種情境保障中而各暢其能、各在其在。

作為特殊形態之地理圖式，渾沌、理序二者所寓治道理念之差異僅在：前者所揭，乃一至高之理想模型而被繫諸往古，以成典範；後者所揭則被置諸當下，以示契道之所當法、當則。然而，必須指出，當後者所示一切理序之能為人、為帝所敬謹法循，而它最終所指向、所回歸之治政理境，實際也正在向渾沌型圖式所展現的大美勝境而進趨。於是可指，《淮南》所著意建立的地理的理序性，正在於綰合漢當代之存在情境（文明的、大一統的）與古美（素樸的、萬有各暢其是的）之距離，而並存其善；即理序以保存無序之大序。

底下謹結構的列示諸型地理圖式暨其相關之治道邏輯蘊存，以結束本文：

表一 「地理——王政」關係架構簡示

地理圖式	表徵時代	秩序型態	價值意識	行事特徵	王政格局	蘊向空間
渾沌型	上古	始原秩序	冥一意識	味道而在道	無政之政	共榮空間
表象型	晚世	自然秩序	宰控意識	味道而悖道	有為之政	宰制空間
理序型	當今	神聖秩序	欽畏意識	明道而法道	法道立政	共榮空間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81，金陵書局本。
-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
-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增修版）》，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2003。
- 漢·劉熙撰，清·王先謙疏證，《釋名疏證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 魏·劉劭，梁·劉昫注，《人物志》，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8。
- 晉·程本撰，《子華子》，元·陶宗儀輯，張宗祥重校，《說郛》，方勇編纂，《子藏·道家部·子華子卷》，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
- 唐·房玄齡等撰，楊家駱主編，《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
- 宋·吳淑撰注，冀勤、王秀梅、馬蓉校點，《事類賦注》，北京：中華書局，1989。
- 清·王先慎集解，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7。
- 清·王先謙集解，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0。
- 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尚書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清嘉慶二十年(1815)南昌府學刊本。
- ，《重刊宋本毛詩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清嘉慶二十年(1815)南昌府學刊本。
- ，《重刊宋本周禮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清嘉慶二十年(1815)南昌府學刊本。
- 清·郭慶藩集釋，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5。
- 清·陳立疏證，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
- 清·程樹德集釋，程俊英、蔣見元點校，《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7。

二、近人論著

- 王巧慧，《淮南子的自然哲學思想》，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 王明珂，《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15。
- 何雙全，〈天水放馬灘秦墓出土地圖初探〉，《文物》1989年第2期，頁12-

25。

余英時撰，陳高華譯，〈漢朝的對外關係〉，崔瑞德（Denis Twitchett）、魯惟一（Michael Loewe）編，《劍橋中國秦漢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頁 356-441。

李零，《中國方術續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

李增，《淮南子》，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

——，〈《淮南子》哲學思想研究〉，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1997。

李慶豪，〈「本始關係」的遺落與復歸：《淮南子》感應論略探〉，《淡江中文學報》第 40 期，2019 年 6 月，頁 295-328。

孫紀文，《淮南子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荊門市博物館編著，《郭店楚墓竹簡·太一生水·魯穆公問子思》，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地圖的整理〉，《文物》1975 年第 2 期，頁 35-45。

——，〈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駐軍圖整理簡報〉，《文物》1976 年第 1 期，頁 19-26。

高麗珍，《淮南子神話與古代地理知識》，臺中：白象文化事業公司，2020。

張雙棣校釋，《淮南子校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曹婉如，〈有關天水放馬灘秦墓出土地圖的幾個問題〉，《文物》1989 年第 12 期，頁 78-85。

郭沫若，《十批判書》，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陳廣忠，《《淮南子》科技思想（增訂本）》，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6。

陳靜，〈漢代大一統政治歷史的理論建構〉，馮達文主編，《兩漢思想與信仰》，成都：巴蜀書社，2013，頁 12-18。

——，〈自由與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4。

陳麗桂，《《淮南鴻烈》思想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

陶磊，《《淮南子·天文》研究：從數術史的角度》，濟南：齊魯書社，2003。

馮耀明，〈論所謂中國古代的自然主義——評李約瑟的觀點〉，楊儒賓編，《自然概念史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 381-410。

黃懷信校注，《鵠冠子彙校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

楊儒賓，《五行原論：先秦思想的太初存有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8。

劉笑敢，《老子古今：五種對勘與析評引論（修訂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劉銘緯、賴光邦，〈中國古代城郭都市型態簡論——坊市革命以前華夏都城型態的聚合、分化與其制度化程序〉，《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16期，2010年12月，頁79-119。

蔣禮鴻注，《商君書錐指》，北京：中華書局，2006。

黎翔鳳校注，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

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顧頡剛，〈禹貢注釋〉，侯仁之主編，《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頁1-54。

吉瑞德（N. J. Girargot）撰，蔡覺敏譯，《早期道教的混沌神話及其象徵意義》，濟南，齊魯書社，2017。

段義孚（Yi-Fu Tuan）撰，王志標譯，《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

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撰，葉穎譯，《天下時代：秩序與歷史（卷四）》，南京：譯林出版社，2018。

Space, Fictionalization, and the Rule of Emperors— Analyzing the Logic of Governance in the Study of Geography in *Huainan*

Lee, Qing-hao^{*}

Abstract

How do we connect the geographical theory of *Huainan*, which is full of fictional traits, with “governance” and the realization of its active governing and assistive purposes? In addition, there are two types of terrestrial forms in *Huainan*: order and chaos: What are the actual characters of the two forms? What are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each other? Why are they establishe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se questions by interpreting the study of geography in *Huainan* as a set of spatial metaphors of values, based on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geography” and “geographical thoughts.” By deconstructing these metaphors,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study of geography in *Huainan* is a set of spatial systems grounded in the core of “wu wei” (inaction) in Taoism, and the ultimate yearning of *Huainan* is to regulate the laws of the world with a sacred order that guarantees the realization of such Taoist creed. In terms of its theoretical form, *Huainan* displays a unique pattern of originating from and tracing back to Taoism.

Keywords: *Huainanzi*, “Terrestrial Forms”, geography, chaos, Taoism

^{*} Doctora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mail: qinghao459@gmail.com